

网络舆论与中国外交的互动

——基于东亚网络民族主义案例的考察

赵瑞琦¹, 杨子洁²

(1. 中国传媒大学 传媒教育国际联盟总部学院, 北京 100024)
(2. 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公民主权在新技术资讯平台上的不断彰显,网络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形成及其效果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两者的互动过程是复杂的。案例显示,网络民族主义通过网络民意支持以增加回旋余地、网络舆论使外国感到压力并调整对策等层面,对外交有正面的助推作用。然而,网络群体极化的普遍特征混杂着中国特色的悲情意识,使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也失于过度敏感、极端,甚至伴有黑客行为,从而对外交推行形成阻碍。在重复博弈的互动过程中,网络民族主义因言辞与行动存在落差、好恶态度变化太快等特点,更进一步削弱了其在积极层面对外交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外交;网络民族主义;群体极化;悲情意识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420(2013)03-0025-06

民族感情的网络表达,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所谓网络民族主义,是指一国民众的民族主义言论、情绪和思潮在网络空间进行传播;进而,在一定的条件下,由此形成的网络舆论会推动现实行动以达到预期目的^{[1]8}。

根据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达到5.64亿。这些数目众多的网民,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表达观点,形成了“新意见阶层”,他们“口无遮拦、激情四射、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

主观而言,“新意见阶层”具有一定的爱国情怀,强调“不让祖国受委屈”,愿意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来推动中国外交。客观而言,两者互动的模式、过程和效果是复杂的,并随着社交媒体形态的演进而变化。

一、网络舆论对外交的助推

1. 网络民意的支持增加外交回旋余地

在很多外交场合,政府表态会留有余地,不愿把话说得太生硬。但是,这种措词得当的表态,有时会失去应有的分量和力度。

而网络舆论则不同。它可以用一种肯定甚至是激情的语气把政府的真正要求表露出来,其好处在于既可以不承担外交上的责任,又可以直接把中国人的要求和感情表达得最有分量、最有效果^[2]。这样,政府和舆论,一正一辅,相互作用,形成合力:尽管政府的态度只有一个,但民间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甚至有鹰派、鸽派之分。这种局面就等于告诉其他国家,中国人其实有很多意见,也会有很多选择,目前的政策并非一成不变,你们看着办——如此,可能会更有利于外交政策的成功。

收稿日期:2013-07-14

作者简介:赵瑞琦(1972-),男,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民族主义、传媒外交、国际新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经验转向时代’的技术伦理规约机制及模式研究”(13BZX024);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西方技术哲学发展的逻辑线索及其趋向研究”(12YJA720032)

在网络舆论以越来越大的力度改变中国政治与外交的背景下,任何忽视中国民间声音的国家都将付出“政策成本”。作为中国麻烦不断的邻居,日本方面很早就强烈感受到中国民间力量通过互联网释放出的能量,知道对日强硬并不完全是政府的主动选择,而是有强大的民间基础。日本《产经新闻》2003年12月30日刊登《日中关系出现新现象》的文章,写道:“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反日网站在迅速增加。从大型反日网站‘爱国者同盟网’扩展出来的链接包括主页在内就有70多个。他们通过在官方网站上有组织地发表评论,已经对官方媒体的论调和中国的对日外交政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大部分的中国反日网页都是最近两年才建立的,从公开的会员数量推测,‘经常性会员’大概有10万人左右。中国国务院和外交部也对这种网上的反日舆论做出了敏感反应。网上展开了反对北京到上海的高速铁路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签名行动,一周时间内就有约8万人签名,中国政府年内做出决定的计划也因此搁浅。胡锦涛政权虽然表示重视对日外交,但也考虑到网上舆论的反对,日中首脑互访毫无进展。一位中国当局者透露,‘我个人能够理解小泉首相迫于舆论不得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因为我们说服不了中国的舆论。’他暗示了不能无视网上的舆论。”^{[3]78}

在2003年中国民间的反日抗议活动中,网络民族主义的作用显露无遗^[4]:由网络组织和发动的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签名(总数接近1亿)和请愿行动,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的同情与支持,极大地削弱了对日本候选国资格的全球支持,削弱了日本入常的努力,同时减轻了中国政府阻击或否决倡议日本入常提案的代价,避免了到最后不得已单独行使否决权的不利局面。

2. 网络舆论使外国感到压力并调整对策

在网络舆论缺席的年代,中国国内舆论的力量很薄弱,极难影响外国政府的决策。外国政府很清楚:中国媒体和民间的声音不过是重复政府的态度而已,只需与政府打交道而不必考虑中国的国内舆论。这样,中国政府真正代表中国多数人意愿和利益的外交政策,也会被外国政府视为单纯的政府决策,而不是代表了多数中国人的真

实愿望。毕竟,一项单纯的政府决策,既可以通过政府想法变化也可以通过互相协商来加以改变。而要改变真正为国内多数人所推动和认可的外交政策,外国政府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政策成本”即改变政策才能达成。

朝鲜半岛上的风风雨雨为此提供了鲜活的对比案例。朝鲜核危机期间,朝鲜百万群众集会、振臂高呼支持当局政策的场面并不鲜见。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只是并不能代表朝鲜人民真正心声的假象。核政策只是当局甚至只是最高领导人自己的意见。这样的政策随时可能被外来的一桩援助、一种姿态甚至是当局领导人自己的不同考虑而有所变化。而当这项政策改变时,那些曾经“坚决支持”的群众只能不置一词。相反,韩日在发生岛屿争端时,由于韩国国内巨大的民间声音,让日本当局意识到:韩国民间力量的强硬,使得韩国政府不可能就此问题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和退让;双方最终选择的方案,不但要与韩国政府协商,而且还要经过整个韩国舆论的认同。同时,民间力量也能够在社会层面上对交往国的民间舆论产生于己有利的影响:日本各媒体都注意到韩国民众高涨的守岛情绪,这种情绪也促使日本国内的媒体和公众舆论思考,应当如何在独岛问题上与韩国相处。这种公众舆论变化也影响到了日本政府的态度。

2005年,因为反对日本入常而在中国国内与网络上掀起了汹涌的反日浪潮。受此影响,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主动表示,不希望再相互谴责,希望与胡锦涛主席在4月底的亚非峰会上会面,不(因为中国人在游行时攻击日本使领馆而)寻求道歉。用法新社的话讲,这是小泉“主动伸出了橄榄枝”。为表示诚意,在4月22日,小泉表示对历史罪行深深悔恨并诚挚道歉。

可以认为,在从精英外交向公众外交转变的过程中,自公共力量中产生的自发性外交思考,尤其是网络舆论的自觉行动,实际上推动了外交层面的努力与外交效果的取得。

二、网络舆论对外交的“捣乱”

每一个新崛起的大国都对最近一次的失败耿耿于怀。在很大程度上,这源于悲情意识。悲情

意识往往是一种优势文化遭到挫折后产生的意识,当其再次遇到外来刺激时,出于反制或是抵消对方的心理需要,辉煌历史会从记忆中涌现出来,形成更加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与此相应的对对方的排斥感^[5]。历史记忆中的光荣与耻辱形成的悲情意识,潜藏在许多中国人心中。

1. 网络“群体极化”下的悲情意识

在中国的网络空间中,凡是跟日本有关的负面新闻,不管是大事、小事,从领土争端,到商业合作,从中国艺员的无知,到个别日本国民的私德欠缺,都必定引来网上或大或小的讨伐之声,有草木皆兵之嫌。

这与人类固有的、并在网络平台上进一步加深的“群体极化”现象有关。所谓“群体极化”,即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6]47}。对于以群内同质化、群际异质化为特点进行聚集的网民来说,这种倾向或偏向尤其严重——其危害性不言自明:“真实世界的互动通常迫使我们处理不同的东西,虚拟世界却偏向同质性,地缘的社群将被取代,转变成依利益或兴趣来结合的社群”^[7];同时,某些消极与灰暗成分,在这种机制下被推波助澜,于是,网络上各种情绪性的,甚至是仇恨的或对社会不满的群体更容易相互联系、彼此影响。这些声应气求的人们在讨论中往往产生过分的自信、极端及对他人的藐视,有时甚至倾向暴力,最终造成敌对与不宽容的片面与偏激在虚拟空间泛滥。如此情绪会或多或少蔓延、外溢至现实空间,并威胁社会的团结。这种趋势,对于像中国这样异质性高(56个民族组成)、偶尔面临国家分裂危机(藏独、疆独和台独)国家来说,尤其需要重视:允许不同民族特色存在的同时,国家整体观念的一致性也极为重要。

考察中国民间舆论在外交问题上的情绪表达,可以发现网络起着同样的放大情绪、鼓励极端网络暴力的情况:提倡对日新思维的人士会被板砖和口水所淹没,不愿也不敢直抒胸臆;喊打喊杀的帖子则会被网友顶成“超高楼”而一直置顶,并不断强化某些人的“刻板成见”,出现对于不同意见的语言暴力和人身攻击。同时,一些具有情绪色彩的涉外问题网站,绝大部分都与看法类似的网站链接,很少与持相反看法的网站或新闻链接,

使得很少能有不同意见或信息来平衡网民亢奋的情绪。这完全可能导致在事实认定和价值判断上犯错。

2. 网络舆论对外交的阻碍

某些基于悲情意识的民族情绪,会毫不隐讳地通过公开的甚至是极端的语言和行为表达出来,其特点是一触即发,易形成情绪对抗。这与外交原则相悖。基于理性算计,精明的外交常常是隐而不发,可以为等待时机而选择沉默甚至是退让。因此,公民的悲情意识经常导致的极端言语和行为,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政府的压力,有时会干扰对外关系并/或影响国家形象。在网络环境下,这种悲情意识会在更深程度与更广范围上被放大。

(1) 过于敏感

2006年7月,网易公司开发的网络游戏《梦幻西游》遭到一些“爱国网民”的声讨:有玩家在游戏中发现“建邺城衙门”内出现了酷似“太阳旗”的背景。此发现传开后,许多玩家表示“受到侮辱”。由于抗议者众,该区其他玩家几乎无法正常游戏。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越也曾因为佩戴了一条被指认为是“日本国旗”的白色方形、棕色圆点的丝巾而大遭挞伐。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对被诬为“汉奸”的同胞造成伤害,也令外国人感到不解或嘲笑。更有甚者,正是在这种敏感心理作用的过度想象下,在不少网民眼中,涉及一小撮人的治安事件(如2003年9月16日,日本公司职员珠海国际大酒店集体召妓事件)就上升到事关国家关系的层次了。

网络无国界。一些中国网民的过度敏感和超常想象所引起的众声喧哗,会影响外国对中国公民的观感与态度——尤其是西方媒体在商业动机下喜欢报道耸人听闻的负面新闻,中国公众的形象的受损也会导致国家形象的失分,而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助于塑造国家软实力。

(2) 失于极端

中国公民与网民悲情意识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侵华所造成的巨大苦难。于是,网络舆论中针对日本的偏激反应处处可见。这些网络言论往往失之偏激幼稚狭隘,仅是情感的原始表达,甚至是失控形式的鲁莽情绪发泄,缺乏系统化和理论化,一些极端者“毫无顾忌地在网站

上发表和转载反日、仇日的言论和文章,乃至于号召抵制日货、强攻钓鱼岛”,并在现实中造成了殃及无辜的案例。

这些平常环境下不会说出的过头的话、或即使说了也不打算付诸实施的话都在网络上体现出来,从而容易向外界传递一个错误的资讯与印象,造成或是加剧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摩擦与对抗。同时,一些悲情意识浓重的网民希望通过新的战争来实现“雪耻”,于是,妄言“东京大屠杀”的帖子总能得到中国网民的不少喝彩。

本就授人以柄,再加上某些国外媒体的有意炒作和以偏概全,这些网络声音会引起国外对中国人素质的非议。因为全球公民社会发展所导致的非国家、非官方因素对国际政治的不断介入,全球性问题在威胁着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传统民族国家无法处理的挑战越来越多。于是,在理性的知识界和民众态度所形成的国际舆论压力下,排他的、自私的国家利益主导国际政治的传统做法正在淡化,超阶级、跨国界的世界被越来越多地想象和接受。结果,人们越来越多地为着跨国利益而分化组合并采取行动。在这种趋势影响下,一国国民的褊狭与自私难以再理直气壮地躲在“国家利益”的遮羞布下我行我素,而必然要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从而影响国家形象。

(3) 黑客行为

按照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所说,中国黑客与外国黑客不太一样。外国黑客的特点是我想干就干,谁也不怕,中国黑客是又想干,又对中国的法律比较忌惮。所以,总想把这种行为与爱国主义相联系起来,找政治与外交问题同他们的行为进行捆绑,为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作挡箭牌。于是,当台海局势恶化时,当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时,当中国利益在海外遭受损失时,他们就在几乎同一时间内一起发动猛攻^[8]。

在外国人看来,这种表现的整齐划一现象证明了中国黑客是很有组织的力量,至少得到了政府的默许。然而,实际上,中国是发达国家之间网络间谍战的最大受害者,在被国外远程控制的僵尸网络的“肉鸡”(对被黑客控制的电脑的称呼)中,中国的受害电脑数量是最多的,来自中国IP地址的攻击很可能并非中国人主动所为。

网络安全是个世界性问题,很难指向或锁定

某个国家。但是,所谓的“中国黑客论”、“中国网络间谍案”的甚嚣尘上还是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现实利益,如,有美国游说团体登反华广告,呼吁提防中国黑客;美国国会曾因“中国黑客”问题阻挠白宫和其他美国政府部门订购中国联想电脑;英国JIC智库警告英国政府和警方,应避免在电脑互联网设备更新时使用中国产品。

(4) 恶性互动

悲情意识会导致一国国民的自豪与排他情绪。极端情况下,这种情绪甚至是执著地美化自己、贬低他人,不承认或不正视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这会在无国界的网络上导致中国网民与外国网民的恶性互动。如果外国网民也因此变得充满敌意,会影响该国政府选择强硬政策。

2008年11月,韩国《中央日报》的调查显示,中韩两国人民感情正在恶化,有59.8%的韩国人对中韩关系抱以否定看法,比前一年的34.5%增长了很多;中国也达到了16.4%,比前一年的6.6%增长了2倍多。两国民众感情出现如此迅速恶化,据韩国《中央日报》引述延世大学白永瑞教授的话说,“在中韩两国的青年人中,互相持否定看法的人增加了很多”,“据推测,这是由于通过网络散布民族主义情感造成的”^[9]。此言不虚。如,韩国部分网民在汶川地震后发表的幸灾乐祸的言论,引起中国网民的极度愤慨。尤其是韩国SBS电视台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将开幕式彩排细节公开播出,更是被中国网民视为不守诚信的卑鄙之举。而在2004年7月27日,韩国国学院和国学运动市民联合会通过各门户网站呼吁网民29日对中国一些重要网站发起群体性攻击,行动名称为“e-click运动”,目的是“把中国掠夺我国历史的野蛮行为公之于世”^[10]。在这种不友善的氛围下,2008年2月10日韩国第一号国宝崇礼门被烧毁后,中国网民发表的一些不当言论,也激起韩国网民的愤慨。

互联网的全球传播特性,使得任何一国网民的不当言论都会迅速被他国网民获知。中外网民间的恶性互动,无助于营造中外友好的氛围。

三、重复外交博弈下的网络舆论效力

多数情况下,网络舆论与中外关系的互动都

不是单次博弈,而是一种动态的重复博弈。在每一次外交斗争后,外国政府都会进一步观察、认识与总结中国网络舆论的特点,藉此来判断其力量与影响到底有多大;在下一轮外交斗争中,它将根据此次判断的结果来继续或修正自己此前的行为模式。

在看到中国网络舆论的参与人数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大,能够不断引起外国政府注意力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中国网络舆论存在的不利于发挥自身力量的特点。

1. 言辞与行动的落差

单从网络语言来看,中国网民可能是非常激进的一群:在诸多中外摩擦事件中,号召抵制外国或外国货的口号随处可见。然而,其一,许多想法失于幼稚,事实上并不可行,那些以牙还牙式的反制措施经常很显然地脱离实际。至于那些建议同恐怖分子联手反对西方的人的语言则更像是在宣泄一时的怨气,没有考虑到恐怖主义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舆论上都已站不住脚。其二,言辞与行动并不一致。在表现过爱国主义之后,作为发出这些口号的主体,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们通常是日本电器照买,美国食品照吃,好莱坞电影照看,国照出。可以说,许多人对其言语并不打算真的实施或至多部分实施,他们只是打算借此来发散怨气,没有考虑到以后能否付诸实施的现实性。

从积极角度理解,这种“说说而已”的网络舆论,与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海纳百川,愿意吸收不同种族文化的历史轨迹有关——并不想真正与不同文化僵持。从消极层面来看,空城计一唱再唱,其效果会趋向于零:外国不会再因为中国网络的“抵制声音”而害怕或改变政策。同时,喧嚣热闹的表象与空洞的实质内容之间的反差,越来越多的人会质疑由网络来塑造公共议题和领导公共话语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2. 喜恶态度变化太快

中国网民态度,常会因突发事件与媒体宣传而变化,从而形成仍受政府控制的印象,进而削弱其在外国决策者心中的分量,很难得到国外的尊重。

与之前普遍存在的反日情绪不同,在2007和2008年中国公众对日本的认知和态度较

2006年有了明显变化。根据2008年9月8日在日本东京公布的由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集日本政界、媒体、产经等各界精英为一体的超党派组织)共同实施的第四次中日联合舆论调查结果^①显示,在对“您对中国/日本印象,一年以来变好了,还是变差了?(单选)”的回答中,中国被调查者(N=1557)有54.3%选择“相对来说变好了”;在2007年,是47.5%。而2006年则只有28.0%。与此相适应,认为中日关系相对较好的人数也大为增加:普通公众舆论从2007年的23.2%跃升到51.2%;作为网民主体的学生则从7.7%猛增到41.8%。在这种变化的背后,实际上影响中日国家关系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解决,影响中日友好的障碍依然存在。那么,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究其原因,一是受政治氛围的影响;二是受国家媒体的宣传。小泉首相下台后,中日两国首脑开始互访,中日关系转暖。中国媒体随之对于日本的负面报道大幅减少。中国对于安倍“不说去也不说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模糊战术并非十分满意,但并不纠缠于此。至于2008年中国民间对日态度能够更进一步,则与日本在中国抗震救灾中的表现有直接关系。

反观日本,在对“您对中国/日本印象,一年以来变好了,还是变差了?(单选)”一问题的回答中,变化比例不大。在“对中国印象”一项的调查中,被调查者(N=1000)中,相对不好的比例变化不大,都是60%左右。日本舆论的这种状况,除了“毒饺子事件”等实质性事件的影响外,与日本媒体与压力集团的态度不无关系。因为日本领导人改善对华关系并非是因为“亲中”,更多的是因为不想因外交问题节外生枝,或是想树立善于与国外沟通的形象以提高支持率,所以,对于

^① 据中国日报总编室主任孙尚武及“日本言论NPO”代表工藤泰治介绍,此次舆论调查于2008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在中日两国同步进行。包括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沈阳等5个城市在内的1557名市民,以及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5所重点高校的1037名学生参与中方调查。中方城市居民调查和学生调查分别由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和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完成。日本方面共有1000名市民和400名知识阶层人士参与了日方问卷调查。由于中国网络人口的组成比例是中国自然人口的组成比例越来越接近,可以认为这种统计结果基本反映网络舆论的状况。

中日首脑会谈,日本大众媒体最喜爱使用的标题之一是“日中(相互靠拢)演出”,有意无意地向读者传达如下的信息:“这是一场外交秀”。更有甚者,日本一些媒体和专家,抨击“弱势首相”的“软弱态度”,要求首相敢于做“对方不愉快”的事,甚至不惜打出参拜牌或西藏牌。实际上,从客观效果来讲,这也是日本媒体利用所塑造的舆论为正在进行艰苦谈判的日本官员加码,为正在“演出”不便提出高额要求的首脑喊价。

比较这两种舆论效果,应该说,较独立舆论对外交运作效果的支持反而更大;外国政府如果形成中国网络舆论仍受政府控制的印象,是不会太在意网络舆论的取向的。

由此可见,公民的参与和发声,不单是使得中国外交获得前所未有的合法性与动力支持,也会使之受到阻碍和掣肘:因为网络舆论起于感情、聚自草根、尽心随性,不可能像专业人士掌控的精明外交那样行于当行、止于当止、收发有度,在强硬的时候,它可能会表现得过于情绪化乃至极端,从而挤压了外交的妥协与回旋空间。因此,可以认为,作为中国外交“捣乱的助手”的网络舆论,离发挥更具建设性作用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

参考文献:

- [1] 赵瑞琦. 网络爱国主义: 源流、利弊与策论[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2.
- [2] 李开盛. 民间论政与中国外交[EB/OL]. [2013-01-25]. <http://www.cssm.org.cn/view.php?id=13019>.
- [3] 乔舒亚·库珀·雷默. 中国形象: 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4] 韩轩. 网络民族主义发轫 百万签名递交日本驻华大使馆[N]. 国际先驱导报, 2003-09-19(1).
- [5] 李开盛. 从网络舆论析中国网民的民族悲情.[EB/OL]. [2013-04-23].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2011/1123/49263.html>.
- [6] 凯斯·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3.
- [7] Putnam, Robert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 [8] 李剑. 院士讲述真实的中国黑客[N]. 环球时报, 2009-05-21(6).
- [9] 纪东. 网络民族主义影响 中韩两国人民感情恶化[EB/OL]. [2012-11-23]. http://www.stnn.cc/pacific_asia/200811/t20081128_913692.html.
- [10] 韩国网民计划攻击中国主要网站以抗议歪曲高句丽史[EB/OL]. [2012-12-28].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231528&boardid=1>.

On the interplay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s and Chinese diplomacy: Based on the case studies of East Asia's Internet-patriotism

ZHAO Rui-qi¹, YANG Zi-jie²

- (1. Mleague International Faculty,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anks to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platform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emotions, Internet-patriotism is impos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and effects of diplomatic policies, and their interaction is a complicated process. Case studies show that Chinese Internet-patriotism, on the one hand, exerts a non-governmental support fo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y providing more room for maneuvering and more pressure for other countries to adjust their solutions. However, the common feature of the network group polarization mix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tragic consciousness would easily lead to over-sensitiveness and extreme reactions even accompanied by hacking, so Chinese Internet-patriotism sometimes impedes prudent foreign policies. During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of repeated game, due to its flaws like lip service and easily changed attitud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Internet-patriotism on foreign policy is further weakened.

Key words: Chinese diplomacy; Internet-patriotism; group polarization; tragic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 刘云)